

第14届粤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2010年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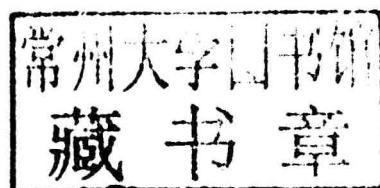


第14届粤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主编：义祥辉 刘村汉

副主副：张秀珍 陈小凤 彭志雄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0年

方言会议照片



广西师范大学刘村汉教授主持开幕式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
义祥辉教授致开幕词



暨南大学詹伯慧教授报告



湖南师范大学鲍厚星教授报告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张振兴教授报告



主任国社
磊科院语
授报告
中任周教
授语言所
方言室



香港理工大学邓思颖教授报告

方言会议照片



香港理工大学张群显教授报告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
林伯明教授致闭幕词



下届粤方言研讨会主办单位
澳门语文学会会长胡培周先生致辞



与会学者在林副校长陪同下
参观校史展览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方言》主编
麦耘教授传授办刊经验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
张振兴 张惠英两教授题词

说 明

一、第十四届粤方言暨第五届土话平话国际学术研讨会本系两个会议之联席，会务统一，

论文则分别处理。

二、大会约定，按照粤方言研讨会的传统做法，会议论文结集成《第十四届粤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三、论文提要和演示稿已在会上散发，没有收进本集（较为完整的长篇提要除外）。

四、会上宣读而没提供文稿的，本集无法收载。

五、海外学者习惯使用繁体字，大陆学者的方言论著也因特殊需要而使用部分繁体字和异体字。本集尊重作者的用字权利，一律按照作者提供的 WORD 文本字体排印。

目 次

王力教授和汉语方言学——在北京大学纪念王力先生学术讲座上的讲话	詹伯慧 (1)
再读《吕黎方言志》，怀念大家丁声树	张振兴 (6)
一个可以被称作方言岛的粤方言	陈晓锦 (12)
廣州話中入調與元音長短之規律再探	黃得森 (17)
广州话后元音的高化链移与高元音裂化	陈卫强 (24)
《廣韻》梗攝在廣州話中的特殊音變	陳永豐 (28)
浅谈 20 世纪广州话的音变	罗伟豪 (34)
過去 70 年的香港廣州話聲調演變	劉鎮發 (38)
一百年来广州话遇摄韵母读音演变研究	伍 魏 (42)
《廣東省土話字彙》與二百年前粵語古知莊章精紐聲母的分合類型	萬 波, 甄沃奇 (46)
深圳粤语声调的识别实验	梁 源, 欧静桦 (54)
香港粵語入聲韻尾的性質——兼及漢語入聲韻尾的演化問題	朱曉農, 嚴至誠 (58)
廣韻逐小韻推導現代粵音初探	張群顯, 張 凌 (68)
從中古音推導現代粵音的理論和實踐	張群顯 (80)
南宁白话新老两派字音举例	洪 珩 (85)
勾漏片粤语的两字连读变调	侯兴泉 (91)
粤语斯氏200词比较	周喜梅, 刘镇发 (101)
南方方言结构助词“咯”考源——兼对“个”源说质疑	肖自辉 (115)
五十年来香港人名的一些变化	林建平, 谢雪梅 (120)
“了、住、过”在清代粤语曲艺文本中的用法	杨敬宇 (125)
贺州(桂岭)本地话的“bA”、“bbA”式形容词(简稿)	陈小燕 (130)
玉林话的否定表达式	梁忠东 (134)
玉林话的单音节句末语气词	苏丽红 (139)
广西粤语复合词的语义构词法研究	李仕春 (146)
广东两阳方言语法特点概说	甘于恩, 容慧华 (149)
編撰《當代粵語正音字典》的一些體會	陳以信 (155)
香港“潮语”初探	李子谦 (157)
从《方言调查字表》例外字读音看桂南平话与粤语的关系	梁忠东 (163)
论粤语和平话从邪不分	侯兴泉 (165)
邕剧舞台语言“戏棚官话”	洪 珩 (170)
广西南宁、百色和玉林地区粤语族群的“语言转移”现象	钱志安, 邹嘉彦, 莫宇航 (182)
《唐字音英語》的再探討	黃耀堃 (187)
濒危语言的记录与立档问题——语档学对方言调查研究的启示	范俊军 (195)

王力教授和汉语方言学

——在北京大学纪念王力先生学术讲座上的讲话

詹伯慧

国庆六十周年大庆刚刚过去，今天有机会再次来到北大，在这里和大家一起缅怀我们敬爱的一代宗师王力教授在推动我国现代学术事业的发展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特别是在推动现代中国语言学发展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感到格外的高兴。面对当今语言科学蓬勃发展，语坛处处欣欣向荣的情景，作为曾经有幸亲自聆听先生教诲的语言专业人士，此刻抚今追昔，饮水思源，对恩师倍增思念与仰慕之情。将近十年前，当北大为纪念王力先生百年寿诞而隆重举行盛大学术研讨会时，我也曾北来躬逢其盛，并以《师道悠悠》一文略述王先生为人治学、道德文章的强大魅力和自己经历过的一些感受。岁月如梭，长江后浪推前浪，今天当我们一代又一代地接过前辈的接力棒，沿着王力先生等杰出学者为我们搭建的阶梯，在传承与创新的理念下步一个脚印地往上攀登时，我们怎能忘却他们的谆谆教诲，怎能忘却前辈拓荒者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之功呢？

根据“讲座”的安排，今天要我跟各位谈谈《王力先生和汉语方言学》这个题目。我虽然在王力先生的亲切关怀和督促鼓励下跨进汉语方言学的门槛已经近六十载，但是，说实在，我对王力先生在汉语方言研究方面的立论和建树却一直缺乏研究，这里只能谈谈个人的肤浅认识和点滴体会，算是抛砖引玉吧！

—

王力教授是最早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调查研究汉语方言的学者之一，在现代汉语方言学的建立和发展中，特别是在现代粤方言的研究中，他是一位建树良多的开拓者。众所周知，在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中，我国老一辈语言学家，从“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开始，到罗常培、李方桂、王力、丁声树、吕叔湘等一些堪称“语言学大师”的重量级学者，从上个世纪初把西方的语言科学理论及语言研究方法引进过来以后，就十分关注对我国各地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前辈学者非常重视揭示各种方言现象在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语言学

中的作用，认为方言的调查研究不仅可以扭转语言研究只重书面文献、不顾口语实际的偏向，也是关乎语言工作者能否全面掌握汉语特色，能否按照科学的方法客观地揭示各种语言现实面貌的最为有效的训练。从事现代语言研究的人，如果有机会从头到尾调查、整理、归纳、剖析过一些鲜活的、未见诸文字记载的语言，这种“解剖麻雀”的功夫，对于一个语言专业工作者的成长和成熟，实在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基于这样的理念，老一辈语言学者无不致力于策划、组织对汉语方言大面积的成片调查（区域调查），如当年以赵元任为首的一批语言学家就计划过一个省一个省地进行汉语方言的调查。他们从1928—1929的两广方言调查起步，接着陆续对陕南（1933）、徽州（1934）、云南（1940）、四川（1942—1946），还有湖南、湖北、江西等省，有计划有步骤地逐一开始进行调查。后来陆续出版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云南方言调查报告》、《四川方言调查报告》等几本巨型的《调查报告》，正是现代汉语方言首批开展分区成片调查所获得的可喜成果，对此后几十年的汉语方言调查产生了积极先行的启蒙作用。与此同时，一些老一辈的语言学家，也同时就自己记录过的、比较熟悉的方言点开展深入的单点方言调查。这中间，王力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虽然没能加入到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策划的逐省成片调查的行列，却在此时对自己熟悉的方言和家乡的母语做了一番相当深入的记录和整理，进而进行分析研究。早在1928年，他在负笈清华大学国学院期间，就开始对两广的方言进行研究，写出了《两粤音说》一文，发表在《清华学报》五卷一期上。这篇论文研究的对象是广西的白话（即粤语）和客语，联系《广韵》的音韵系统辨析了几处方音的异同，并与广东的粤语、客语进行比较。随后他赴法国留学专攻普通语言学和实验语音学，又以当时先进的语音实验仪器对自己家乡博白方言的语音进行实验，撰写了博士论文《博白方言实验录》，获授博士学位。《博白

方言》是用法文寫的，于 1932 年出版。王力先生在这篇论文中揭示了粤语（白话）中不仅有广州的“九声”，还有广西博白的“十声”，并对“博白十声”做了科学的阐释，这一点对粤语声调的研究来说，是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当今方言工作遍地开花，形形色色的方言现象纷纷浮现，我们已知在粤西跟桂东南一带的粤语（白话）中，有十个声调的方言并不只是博白一地，但在八十年前，王力先生对博白方言声调多达十个的论述，确是有开创性意义，能令研究粤语的人耳目一新的。1990 年我在巴黎讲学时，有幸见过这本论文，当时听说当地的旧书店里还可找到，但国内语言学界的朋友，还很少有人读到此书。最近听说北大中文系资料室的《王力文库》有珍藏本，可惜迄今尚未出现中文译本。我们在回顾粤方言研究的历史进程时，总是把王力先生八十年前撰写的这篇博士论文看作是最早引入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从事粤语调查研究的成果，由此而认为王力先生是现代粤语研究的开拓者。事实上，在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以后，王力先生在他的学术研究中，仍然是持续不断地进行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而且研究的对象并不限于粤语。差不多与赵元任先生发表《粤语入门》（1947）、《中山方言》（1948）和《台山语料》（1951）等粤语著作同时，王力先生就和他在岭南大学的学生钱淞生一起对珠江三角洲一些粤方言进行了田野调查，并及时发表了《东莞方言》（1949）、《台山方言》（1950）和《珠江三角洲方言总论》（1950）等论文，引起了方言学界的注意。尽管这些调查还比较粗略，但这几次调查粤语的成果能及时发表出来，对于启发粤语研究者的思路，开拓粤语研究者的视野，突破广东粤语的研究总是在代表点广州方言中兜圈子的局面，无疑是起着重要作用的。王力先生不仅较早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开展方言调查，并且在大致掌握汉语方言分布情况和主要特征的基础上，着手思考汉语方言的分区和归类问题。早期在 1928 年发表《两粤音说》时，他就首先对两广的方言进行了分区。他认为广东、广西两省的方言可分为八区：①广东话，即广东的粤语；②广西白话，即广西粤语；③客話，包括粤东嘉应州及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的客家话，还有闽西和赣南的客家话；④官话，指粤北韶关、南雄、连县一带和广西桂林、柳州、百色一带的“官话”；⑤潮州话；

⑥雷州话；⑦琼州话；⑧其他，指廉州白话、漳州移民话及苗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到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在编著《中国音韵学》。（1935、1956 年重版改名《汉语音韵学》）时，就根据当时所能掌握到的各地方言状况，着眼于语言特征，在该书《现代音》一章中，将汉语方言分为五大系，后来又把这个“五大系”的方言分区体系写进他在燕京大学讲授的《中国语文概论》讲稿中，这本讲稿随后以《中国语文讲话》为名出版时，我们看到王先生在这五大系下面又分列若干小系，构成如下的分区体系：

1 官话 下分五个小系：①冀鲁系，②晋陕系，③豫鄂系，④湘赣系，⑤徽宁系，⑥江淮系，⑦川滇系。

2 吴语 下分四个小系 ①苏沪系，②杭绍系，③金衢系，④温台系。

3 闽语 下分五个小系 ①闽海系，②厦漳系，③潮汕系，④琼崖系，⑤海外系。

4 粤语 下分六个小系：①粤海系，②台开席，③高雷系，④钦廉系，⑤桂南系，⑥海外系。

5 客家话 下分 7 个小系：①嘉惠系，②粤南系，③赣南系，④闽西系，⑤广西系，⑥川湘系，⑦海外系。

尽管随着汉语方言调查工作的日渐深入，从目前可以掌握到的方言实况出发，王先生这个“五大系”的汉语方言分区，跟近半个世纪来我国通行的汉语方言八区说、七区说以至十区说比较，似乎稍嫌粗疏，尚有修订完善的余地。但在六七十年前方言调查工作刚刚起步，方言资料极为匮乏的情况下，王先生能大致了解各地汉语方言的总体面貌，归纳、梳理出这么一个粗略反映方言分区实际的体系来，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说明当年王先生通过自己的仔细观察和调查记录，对复杂的汉语方言已经初步形成“心中一盘棋”了。王先生这一“五大系”汉语方言分区说，在学术界有过相当的影响。据我所知，日本汉学界直到 1969 年 9 月修订出版《中国语学新辞典》，仍然沿用王先生这一“五大系”说来撰写《辞典》中相关的条目。

二

王力教授善于把汉语方言的研究和汉语史的研究密切结合起来，让汉语方言的丰富资源在科学论证汉语历史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大量事实说明，汉语诸方言都是汉语历史发展

的产物。当今汉语方言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特点，正好折射出古代汉语的真实情况，见证着汉语发展的历史轨迹，人们常常把保存在某些方言中的特殊语言现象视作古老汉语的“活化石”，这就说明现代汉语方言跟古老汉语之间存在着继承发展的密切关系。王力先生是我国汉语史研究领域的领航者，他对蕴藏在各地方言中的语言现象跟汉语历史发展之间错综复杂了解最深，最善于利用这些关系来科学地阐释汉语史中的种种问题。拿语音来说，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凡是触及汉语语音的历史发展，总要提出一些汉语方言的语音特征来说明问题。无论是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出版的我国历史上第一套《汉语史稿》（1957）、还是在辞世前不久才出版的《汉语语音史》（1985），我们都可以看到王力先生在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汉语史稿》第一章《绪论》中有一节题为《汉语史的根据》，王先生一开头就把方言作为汉语史的重要依据提出来。他说：“首先要说：现代活生生的口语就是汉语史最好的根据。现代汉语的方言是复杂的；正是由于方言的复杂，更有足够的语言事实来证明汉语发展的过程。例如粤方言保存着古代的-m、-p、-t、-k等韵尾，吴方言保存着浊音系统，都可以拿来和古代的韵书、韵图相印证。我们不但由现代方言中证实了古音的系统，我们甚至能利用方言的事实来‘重建’古代的音值。”（《汉语史稿》上册 20 页）。在《汉语语音史》的《导论》中，王力先生又特别列出《方言》一章，明确指出方言知识是研究汉语语音史必备的基础知识。他说：“我们研究汉语语音史，应该先大致了解现代汉语的方言。因为语音史的研究，要求我们讲述汉语语音经过多少次的变革，成为今天的样子。如果我们只讲成为今天普通话的样子，那是很不全面的。普通话也是以一种方言为基础形成的。”（《汉语语音史》11 页）。下面让我们从上述两部著作中举一点实例来看看王力先生是如何把方言的现象用到研究汉语语音发展史的实践中来的。

在《汉语语音史》下卷论述语音的发展规律时，王先生以三章的篇幅讨论了汉语语音发展中的自然变化，包括辅音的变化、元音的变化和声调的变化。在论述辅音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的历史变化时，对每一个辅音发展变化的阐述，都用汉语方言中存在的事实来阐明他所提出的论点。例如论及发音部位相同的辅音在发展中可能出现“互转”的变化时，他认为[n]

和 [l] 发音部位相同，只是发音方法有别，因而可以产生“互转”。就以汉口、成都等“西南官话”方言 [l] [n] 今都念为 [n]（连、兰均为 n-），而厦门、潮州等闽方言则相反，“男”、“念”均为 [l] 为例来印证这一 [n] [l] 可以互转的理论。同样的道理，王先生又举现代厦门话为例来说明 [m] [b] 也是因为发音部位相同、只是发音方法不同而可以“互转”的事实。按照王先生这一汉语语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形成“互补”的理论，面对一些比较特别的语音现象，例如粤语中原为塞音声母的 k'（古“溪”母）今念为擦音声母 h（古“晓”母）——“可”、“开”、“口”等都是 h 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又如在《元音的变化》一章中论及汉语韵母构成的历史变化时，王先生认为古代“两呼八等”发展合并为“开齐合撮”四呼，后来又因为四呼只是韵头不同，容易互相转化，进而出现“转呼”的现象。在论述这一韵母结构中因“转呼”而出现的复杂现象时，他充分利用了自己熟悉的方言，特别是粤方言和吴方言在这方面的具体表现来印证，并借此对粤方言韵母结构中存在有争议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在对待粤语是否丢失韵头，是否四呼不全，结合到汉语语音韵母结构发展变化中出现韵头消失问题的探讨，面对现代粤语音韵结构的现实，王先生反复琢磨，最终纠正了自己此前曾经由于对粤语韵母系统理解不够，导致在早年的著作《汉语音韵学》中把粤语的韵母同样看作四呼俱全的错误。他说：

“从前我以为现代广州话有开齐合撮四呼，那是错误的。现代广州话实际上没有韵头，主要元音虽有 [l] [u] [y]，也不必叫做齐齿、合口、撮口了。”（《汉语语音史》558 页）王先生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勇于服从客观事实，修正自己认为欠妥立论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在《汉语史稿》一书中，王力教授具体而详尽地论述在汉语发展各个历史阶段中，汉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是如何沿着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一步一步地发展下来的。其中《上篇》是语音史篇，除第一章为全书（上、中、下三册）的《绪论》外，从第二章起，就分列《由上古到中古的语音发展》和《由中古到现代的语音发展》两部分，连续以十九节的篇幅一一论述由上古到中古声母、韵母和声调的发展及由中古到现代声母、韵母、声调的发展。详近而略远，对上古至中古的发展，一般采取同组概括的方式论述，但对

中古到现今语音发展的阐述，则十分细致，不厌其详。除了对中古声母的发展和中古韵母的发展各有综合性的一般论述外（第17、21两节），对现代汉语中每一个声母和韵母都会以“××声母（韵母）的来源”为题，认真审视其从历史发展情况，细述每一个声，每一个韵如何从古代发展成为现代这样的面貌。读者除了通过书中详尽的叙述了解到每一个现代汉语（民族共同语）的声母和韵母的来龙去脉以外，各地方言声母、韵母在汉语语音发展过程中的不同表现，也纷纷呈现眼前。这就形成了一箭双雕的局面：一方面通过方言的种种表现印证了现代汉语语音的古代来源，看清楚古音演变为今音的历史轨迹，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对各种复杂方言现象的产生原因及其与古代汉语的血缘关系有更加明晰的认识。这既反映了王力先生汉语史研究的总体思路和操作方式，也体现出王力先生广泛驾驭方言资料，充分利用方言资源探清汉语历史发展脉络的研究风格。

三

王力教授一贯倡导语言研究要为语言应用服务。他对方言的调查研究充分表现出这一精神。语言应用的范围十分广阔，语言研究成果一旦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语言应用结合起来，就会增强活力，熠熠生辉！为了便于广大民众的应用，王先生一贯注重语言学著述的通俗化问题。他经常以身作则，为工人、学生编写深入浅出的语文著作，并亲自到工人中去，到中小学生中去，给他们讲语言应用，讲语文知识，深受听者欢迎。大家都知道，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王先生为普及语文知识，提高全民文化水平，曾出版过几本小册子，如《字的形音义》（1955）、《虚词的用法》（1956）、《谈汉语规范化》（1956）等。他经常教导我们，要重视语文教育，要使我们的语言研究工作能为语文教育服务。他说：“我希望同志们多关心语文教育，提高我国人民的语文水平，从而也就是提高我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众所周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南北各地大张旗鼓持续开展推广普通话工作，结合“推普”进行方言调查，把方言调查的成果用到教学普通话的实践中来，逐渐成为方言工作者的共识。当年在全国开展了规模很大的方言普查，接着各地就编写了数以百计的《××地区学习普通话手册》或《××人怎样学习普通话》的小册子。为各地“推普”提供服务。回顾这一方言调

查与“推普”密切结合的历史，王力先生无疑是最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是我们的先驱。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一向重视方言调查为推广民族共同语（国语）服务的王力先生，就已经付诸行动了。他在1936年就写了《江浙人学习国语法》，当时他还打算接下来要继续编写《广东人学习国语法》、《四川人学习国语法》、《湖南人学习国语法》、《客家人学习国语法》、《福建人学习国语法》等，只可惜囿于主观的各种条件，王先生上述编纂计划未能完全落实，付诸实施。但王先生心中总是惦挂着编写学习国语（普通话）书籍的事，一有机会就会动作起来。解放初期王先生在广州任教，鉴于广东几大方言都跟普通话有较大的距离，语音的差别尤为突出，广东人学习普通话面临很大困难，王先生马上想起：如能利用广东方言调查的成果，通过找出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对应规律，运用“类推法”来编写学习国语（普通话）的教材，定可起到举一反三、事半功倍的作用，扭转广东人学习普通话的劣势。在这一思想的驱使下，王先生重萌十多年前的念头，立即动手编写起《广东人学习国语法》来。此书除绪论和结论外分上下两篇：上篇为总论，含语音、语法和语汇三章；下篇为分论，分别为《广州人学习国语法》、《客家人学习国语法》、《潮州人学习国语法》和《海南人学习国语法》。《广东人学习国语法》1951年11月由华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1955年更名为《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改由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本为广东境内（当年包括海南）各大方言区人民学习普通话服务的“学习国语法”，称得上是新中国第一本专为学习普通话而编的“学话手册”。此书内容以比较普通话（国语）和方言的异同为主线，通过总论部分对普通话和广东几大方言之间声、韵、调的差别一一进行比较，从发音的差别到每个声、韵、调所领的字有哪些不同一一做了阐述。在这个基础上，下篇的分论就分别列出各方言中最易弄错的突出问题，将其归纳后以有趣而醒目的短语作为标题分别加以解说，如分论第一章《广州人学习国语法》就将广州人学普通话的通病列为十八项（十八节），然后一一加以论析，指引读者如何克服这些毛病。这十八项都是广州话容易混淆而普通话是截然不同的，标题如下：一 做事和做戏；二 布告和报告；三 保存和保全；四 毛亨和毛坑；五 江先生和张先生；六 黄先生和王先生；七 县长和院长；八 国文

和国民；九 荒唐和方糖；十 少数和小数；十一 无奈和无赖；十二 自然和自言；十三 大臣和大神；十四 松树和丛树；十五 欢聚和欢醉；十六 一斤和一根；十七 大江和大纲；十八 洪流和红楼。看着这些通俗而又有趣的标题，就可以想见王先生为帮助方言地区人民轻松学好普通话，是多么地煞费苦心了。王先生大力倡导方言研究为方言地区语言应用提供服务的想法不仅表现为帮助方言地区人民学习普通话，同时也表现为积极帮助到方言地区来的外地人学习本地方言。为此他在编写《广东人学习国语法》的同时，就着手编写一本供外省来粤干部学习广州话用的《广州话课本》。当时正值“推普”运动风起云涌，大家都全心投入“推普”学习，哪能提倡也要学习方言？王先生毕竟是语言学的权威，他就能够高屋建瓴，意识到普通话要大力推广，方言也应该保留，应该学习的道理，坚持正确认识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坚持两者都应发挥作用，各司其职的观点。他认为在方言地区工作的外来干部，只有学好当地方言，才能和方言区的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才能搞好工作，更好地为当地人民服务。这一看法和我们今天在“推普”的同时仍然强调继续发挥方言的作用，甚至还提出要拯救某些濒危方言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可谓一脉相承。王先生五十年代初开始编写的《广州话课本》经修订后在全国“推普”的高潮中改名《广州话浅说》，由文字改革出版社正式出版。顾名思义，这是一部给非广州话区的人学习广州话用的教本。王先生在书中开宗明义地引进他所提倡的“类推法”，将北京音系与广州音系进行比较，从北京音出发，对每一个北京的声、韵、调对应于广州音声韵调逐一列出，附上可以类推的例字及例外字的情况。全书十六课，前六课概述广州话声韵调及音节构成（书中以“拼音”名之）情况，从第七课开始至第十三课一连七课分述声、韵、调的“类推法”。最后三课选取粤语独幕剧《血的教训》作为广州话举例，让读者看到成篇粤语的真实面貌。《广州话浅说》全书只有七万字，王先生就以这样一本深入浅出，重点突出而又通俗易懂的小册子带引想学粤语的外地人踏入广州话的门槛。据我所知，半个多世纪以前，除了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先生于1947年在美国为初学粤语的海外读者出版过一本用英文写的《粤语入门》（《Cantonese primer》）以外，王先生此书，该算是五十多年前备受国内读者

欢迎的粤语入门书了。

四

以上从三个方面略述王力教授在他那超过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作为一位在汉语诸多领域中都有过杰出建树的语言学大师，尽管限于时间和精力，他的主要精力并未放到汉语方言这一资源丰富、内容复杂而又最富汉语特色的学科中来，但他从接触现代语言科学的时候开始，就始终钟情汉语百花园中这块奇葩绽放的沃土。从上面的略述可以看到，每当我们的语言文字工作，无论是学术研究的层面还是语言应用的层面，一旦需要汉语方言的介入，需要发挥汉语方言的独特作用时，王先生总是乐于运用他长期以来接触汉语方言、洞察汉语方言所形成的立论和所积累的经验，站到语坛的前面，指引我们如何正确理解方言现象，如何有效利用方言资源，发挥方言研究的独特作用，为继往开来，一代又一代地建设好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语言科学；为把涉及千百万汉语及其方言使用者的社会语言文字工作不断推向前进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我就讲到这里，有欠妥处请各位多多指正。

[参考文献]

一、王力教授以下著述（均已收入《王力文集》）：

- 两粤音说 《清华学报》五卷一期，1928 北京
中国语文讲话 开明书店，1950 上海
汉语音韵学 中华书局，1956 北京
江浙人学习国语法，正中书局，1936 南京
东莞方言 《岭南学报》 1949 广州
珠江三角洲方言总述 《岭南学报》 1950，广州
台山方言 《岭南学报》 1950，广州
广东人学习国语法 华南人民出版社，1951，广州
汉语史稿（上册） 科学出版社，1957，北京
广州话浅说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7，北京
汉语语音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北京

二、唐作藩 谈谈王力先生对粤方言的研究 第十三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2008，香港城市大学

三、张谷·王辑国著 王力传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2，南宁

四、张谷·王辑国编 中外学者论王力——龙虫并雕·一代宗师，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南宁

再读《昌黎方言志》，怀念大家丁声树

张振兴

1958年年底，丁声树先生率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组全体人员，到河北昌黎县调查方言。调查结果写成昌黎方言志的简本和详本。简本收入《昌黎县志》，详本就是我们经常研读的《昌黎方言志》，1960年7月由科学出版社印行第一版，1984年7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印行新1版。昌黎方言调查是丁先生领导的最后一次方言调查，《昌黎方言志》是丁先生最后主持撰写的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在此之后，丁先生离开了方言组，主持编纂《现代汉语词典》，一直到驾鹤西归。

熊正辉先生《跟随丁声树先生在昌黎调查方言》一文（《方言》1989.2：104—105），说到丁先生领导昌黎方言调查的前后经过，以及某些细节。文中大处着眼，真实亲切，对丁先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足以让我们对丁先生肃然起敬。大家风范，不由你不景仰。

昌黎方言调查已经过去50周年，《昌黎方言志》出版眼看也是50周年。五十年来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取得很大成绩，其中很多地方都是应该感谢丁声树先生的教诲，拜赐于《昌黎方言志》的指引的。在丁声树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再读《昌黎方言志》，怀念大家丁声树，聊表后人乘凉，不忘前人栽树之恩，令人无限感慨！《昌黎方言志》是一部非常深刻的、周全的方言调查研究报告，虽读之再三，仍有体会，下面大略说说。

一、对方言特点的描写和分析

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必须首先描写和分析方言的最重要特点，做到言简意赅，纲举目张，使读者对这个方言有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深刻的印象。什么是特点？特点是从比较中得到的。跟北京话比较，跟其他方言常见的说法比较。没有比较也就没有特点。特点是相对而言的，不要绝对化。

分析和比较，是调查研究汉语方言最主要的方法，在这个方面，《昌黎方言志》是最优秀的，是榜样。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说。

《昌黎方言志》第叁章讨论昌黎方言的特点。音系特点主要是从现代语音的构造出发，讨论了昌黎话和北京话今合口字 ts- 组和 tʂ- 组的分合；从语音的古今演变规律出发，讨论了昌黎话和北京话今开口字 ts- 组和 tʂ- 组的分合。同时举例说明了昌黎个别字音的特殊读法，如“屁股”说 p̚i⁵⁵ -xu，“锅煤子”说 kuo³²⁻³³ mi¹¹ -tsɿ，“煤”读如“迷”，“做”一般读如“奏” tsou⁵⁵，“取东西、取人（领人）、取牲口（牵牲口）”的“取”说 tʂiou²¹³，等等。此外，还举例说明了昌黎城关阴平、阳平在轻声前读阳去(24)调的现象。词汇特点说得比较简单，只是举例说了一些昌黎的特殊词语，例如“院子”包括宅子和前面的空地；“乳牛”是指母牛，不是指奶牛；“电车”指汽车，“电车道”指汽车路；“大头菜”指洋白菜；用鼻子闻说“听”，把东西藏起来也说“抬”，研究一件事的“研究”说“格物”等。

要特别注意昌黎的语法特点。首先讨论了动词的“没”和副词的“没”，昌黎话和北京话这两个“没”读音是不同的。比较：

	动词	副词
北京	没 mei ³⁵	没 mei ³⁵
昌黎	没 mei ¹³	没 mei ⁵⁵

北京无论是动词还是副词都读阳平，语音上没有区别；昌黎动词的“没”读阳平，副词的“没”读去声。最精彩的是两组比对的例子：

A 你有书吗？ 没书 [mei¹³⁻³³ sɿu³²] — “没”修饰名词，相当于动词用。

你下棋输了吗？ 没输 [mei⁵⁵ sɿu³²] — “没”修饰动词，相当于副词用。

B 你有锯吗？ 没锯 [mei¹³⁻³³ tçy⁵⁵] — “没”修饰名词，相当于动词用。

你把木头锯咧吗？ 没锯 [mei⁵⁵⁻⁴³ tçy⁵⁵] — “没”修饰动词，相当于副词用。

接着讨论了相当于北京话“我看了戏了”的两个“了”，前一个“了”类似词尾，后一个“了”是语气词。昌黎话这个句子说“我看[囉]戏咧”。比较：

	类似词尾	语气词
北京	了 ·lə	了 ·lə
昌黎	[囉] ·liou～·lou	咧 ·lie

北京这两个“了”语音上也没有区别，昌黎这两个“了”语音上是不同的。第三是讨论卷舌化的几种作用。卷舌化北京话也有，如“杏儿、花儿、这儿、那儿、吃儿、玩儿”，但昌黎话的卷舌范围比北京话广，并且有特别的语法功用：

(1) 名词卷舌化相当于加“里”：扔海儿去 屋儿坐去吧 掉缸儿咧

(2) 动词卷舌化相当于动词加“[囉]”：剃儿头咧 走儿火咧 喝儿酒咧 跑儿两回

相当于动词加“到、在”：放儿桌子上 坐儿椅子上 搁儿柜子里

相当于动词加“着”：坐儿车来的 骑儿马来的 哭儿走咧

(3) 形容词卷舌化相当于加“[囉]”：白儿去咧 美儿去咧 远儿去咧

最后是讨论可能补语。“吃得，吃不得；来得了，来不了；拿得动，拿不动”是可能补语的格式。在否定式里，昌黎和北京在格式上没有差别，只是“得”北京读 ·tə，昌黎读 ·ti。但是在肯定式里，昌黎和北京格式不同，连接成分读音也不同。比较：

北京 “动词+得+补语”：来得了 拿得动

昌黎 “动词+补语+[囉]”：

来了[囉] [lai²⁴⁻³³ liou²¹³ ·l (i) ou]

拿动[囉] [na¹¹ ·tuŋ ·l (i) ou]

以上讨论昌黎的语法特点，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语法讨论跟语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离

开语音是无法讨论这些语法特点的。这一点研究方言的人要注意，研究语法的人也要注意。

《昌黎方言志》主要部分说的是方言语音和词汇，涉及语法的部分只有本章所说的四个语法特点，以及标音举例的语法例句，从例句看语法。这是因为昌黎话跟北京话很接近，语法差别不大，讲有差别的几个特点就足够了。其实，从全国汉语方言来看，方言间的差别主要也是语音和词汇，语法的差别相对小一些。现在有人为了强调语法研究的重要性，说方言间语法的差别跟语音词汇一样大，甚至更大。这个说法不符合汉语方言的语言事实。

《昌黎方言志》第肆章是昌黎音的分析。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共时平面上的方言声韵调分析，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不讨论来历。昌黎的声母比较简单，跟北京话差别不大。昌黎韵母表排列了 55 个韵母（不包含轻声的 ·ə），最主要是把[ar iar uar ʌr uɔr]等卷舌韵母算入韵母表了，韵母的分析主要就是围绕卷舌韵母的来源，昌黎内部卷舌韵母的差别展开讨论的，很值得我们学习。

最精彩的语音分析是讨论昌黎的声调。昌黎城关声调连轻声在内有 7 个，如下表：

阴平 32 上声 213 阴去 55

阳平甲 13， 阳平乙 11 阳去 24 轻声

从这个声调表已经可以看出，昌黎方言阳平分甲、乙两类，去声分阴阳两类，在北方官话里是很特别的。更有意思的是，除了上声字以外，平声和去声 5 个调在单读或在连调里，跟轻重读，跟轻声都有很深刻的瓜葛，而且昌黎话轻声的范围广，昌黎话读轻声的在北京话里很多是不读轻声的。所以轻声在昌黎这一类的方言里，最好正式归入声调系统。最重要的是关于阳平乙和阳去：

阳平甲是 13 调，不用于轻声前。阳平乙是 11 调，只在轻声前出现。如：甜 ·的 黄 ·瓜 村 ·子 石 ·头

阴去是 55 调，不用于轻声前，包含其他方言的阴去字和阳去字。阳去是 24 调，多数用在轻声前，少数能单说。如：柜饭被庙；道 ·上 天 ·道 桑 ·树

白·露 黄·病 烦·气。

关于阳平乙和阳去，《昌黎方言志》有两段非常深刻地分析。原文照录如下：

我们现在把 13 调↓、11 调↓、24 调↓都作为独立的调类（阳平甲 13↓，阳平乙 11↓，阳去 24↓）调号记在比较线的左边，不认为变调，调号不记在比较线的右边。这只是处理昌黎城关声调的一种方式，并不排斥其他处理法。按现在的说法，阳平甲不在轻声前出现，阳平乙只在轻声前出现，两个声调并不对立（不在同一语音环境里出现），是否能并为一类呢？如果把这两类合并为一个阳平调，可以把单用的 13 调认为本调，在轻声前的 11 调认为变调。不过这样处理是有困难的。因为单读 13 调的字（如“黄”）在轻声前读 11 调（如“黄·瓜”），也可以读 24 调（如“黄·病”）。什么时候读 11 调，什么时候读 24 调，还不能说出语音的条件，要一个一个列举。既然要一一列举，不如索性把 11 调和 24 调都认为独立的调类，比较妥当一些。

24 调↓是不能不自成一类的。第一，“柜、被”等字可以单用，都是 24 调↓，跟“贵、背腹~”（都是 55 调↑）不同音。第二，“饭”读 24 调，跟读 13 调的“矾”不同音。“天寒”的“寒”是 13 调↓，“天旱”的“旱”是 24 调↓。24 调不能跟 13 调合并。

音位的理论说得多么深入浅出！不固囿于理论，从语言实际出发，尊重语言事实，进行分析和解释，这是联系实际的真正理论。这就是我们的大家丁声树！

二、关于同音字汇和词汇表

方言调查的记音，最后的成果是同音字汇。同音字汇是记音调查的总结，也是记音调查的检验，同时是语音分析的根据。同音字汇是方言调查报告的核心之一。方言语音系统，包括声韵调归纳，语音结构规律，语音演变规律，语音规律的例外等等，都包含在同音字汇里，都反映在同音字汇里。做好同音字汇是汉语方言调查研究人员最重要的基本功，这个基本功

不过关，就没有能力做好方言调查研究的工作。

《昌黎方言志》第5章是同音字汇。这个同音字汇内容非常丰富，包含了昌黎语音分析的各个方面，又鲜明地反映了昌黎语音的共性和个性。阅读《昌黎方言志》，这是一个最应该关注的部分，尤其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1）区分子音和词音。汉字跟读音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方言调查研究来说，单字可以成词（当然也可以组成多音词）的读音叫字音，单字只有组成多音词才能读音叫词音。有些需要特别提示的字既可以是字音，也可以是词音。《昌黎方言志》非常重视区别字音和词音。例如：

字音：巴八pa³² 哺言不正k'ua²¹³ 说suo³² 木mu⁵⁵ 肥fei¹³

词音：嬖~刀pei⁵⁵ 薄厚~pau¹³ 委不利索：~种：~手，事情不安好做nau³²

区别字音和词音，说明词音出现的词语环境，这个记音才算是完整的。

（2）区分多音字。方言里有多音字，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里所说的多音字，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指来历相同的字，在相同的语音环境下，可以读甲类音，也可以读乙类音，说不上有什么语音规律性。例如：“学跃乐音乐岳嶽”，昌黎可以读 [ye] 韵，也可以读 [iau] 韵，这一类字分别用字下加小的数码“1, 2”来表示；另一类是指来历相同的字，在不同的语音环境下，读成不同的音。但是这个语音环境一般是没有规律的。例如：

抹：山撮合口一等入声末韵明母，“~桌子”，ma³²，阴平调；“~布”，ma⁵⁵，阴去调。

把：假撮开口二等上声马韵帮母，“~守，~握”，pa²¹³，上声调；“~门打开”，pa⁵⁵，阴去调。

沙：假撮开口二等平声麻韵生母，单说 sa³²，阴平调；“~米，用水淘去米里的沙”，sa⁵⁵，阴去调，“东~·河乡”，sa²⁴，阳去调。

“抹、把”这两个字北京话也是多音字，但具体情况和昌黎话是不一样的。“抹”北京“~桌子”读

ma⁵⁵, 阴平; 但“～布”也是阴平; “～子, ～粉, ～一鼻子灰”读 mo²¹⁴, 上声; “～·不开, ～面”读 mo⁵¹, 去声。“把”北京“～守, ～握, ～门打开”都读 pa²¹⁴, 上声; 不过“～门打开”也有读 pa⁵¹的, 是去声。“花把儿”的“把”也读去声 pa⁵¹, 是假摄开口二等去声祃韵帮母字“柂”的简化体, 受到字形的干扰, 但来历上是不同的, 不能算是多音字。

来历不同, 意义也不同的字, 往往也造成多音字, 这是另外一种情况。如北京话的“种”, 上声 tʂun²¹⁴, “种类也”, 是通摄合口三等上声肿韵章母; 去声 tʂun⁵¹, “种植也”, 是去声用韵章母。昌黎话“下底下夏姓氏”读 cia⁵⁵, 阴去调, 来自假摄开口二等上声马韵匣母; “下下·巴夏立夏·咧”读 cia²⁴, 阳去调, 来自假摄开口二等去声祃韵匣母。同音字表里, 当然收录这种多音字。

(3) 区分文白异读字。文白异读是指方言里口语和非口语里的两个读音层次的差别。有的方言文白异读成为两个读音系统, 例如闽语的一些方言; 有的方言文白异读现在已经不是系统的差别, 它们的文白差别是依靠本方言的历时比较和其他方言的共时比较得到的, 很多官话方言, 包括昌黎方言的文白异读基本上都是属于这种性质的。例如:

色	哥	我	墨	给	寻	取	醜	
文读	s̪y ⁵⁵	k̪y ⁴²	ŋ̪y ²¹³	muo ⁵⁵	t̪ci ⁵⁵	cyn ¹³	t̪c'y ²¹³	cian ⁴²
白读	sai ²¹³	k̪y ²⁴	uo ²¹³	mi ⁵⁵	kei ²¹³	çin ¹³	t̪c'iou ²¹³	zan ⁴²

同音字表里用字下加双细线表示文读, 加单细线表示白读。现在有的方言调查报告直接在右下加注小字“文, 白”表示, 也是可以的。

(4) 区分轻声字和非轻声字。上文说过, 昌黎话7个声调中, 阳平乙只用于轻声, 阳去主要用于轻声, 此外还有一个单用的轻声调, “玻璃·～葡萄·～裳衣·～的着呢吗”只用轻声。最重要的是, 由于其他方言的阳平字, 在昌黎既可以是阳平甲字, 轻声前又可以是阳平乙字, 还可以是阳去字; 阳去字在轻声和非轻声前, 既可以是阴去字, 又可以是阴平、阳平甲字。因此, 昌黎城关阴平、阳平甲、阳平乙和阳去四

类字有跨调现象。例如:(轻声用右上角加“0”表示)
阴平——阳去 天³²天⁰: 天²⁴道⁰ | 公³²的⁰: 公²⁴鸡⁰ | 乡³²村⁰: 乡²⁴下⁰
阳平甲 阳平乙——阳去 甜¹³: 甜¹¹的⁰: 甜²⁴味儿⁰ | 黄¹³: 黄¹¹瓜⁰: 黄²⁴病⁰
阴去——阳去 道⁵⁵: 道²⁴上⁰ | 抱⁵⁵: 抱²⁴上⁰ | 柜⁵⁵: 柜²⁴

可见, 轻声在昌黎方言是至关重要的。昌黎同音字表里, 必须区分轻声和非轻声。例如:“拔”是 pa¹³阳平甲调, “拔鞋～·子, 鞋·～”是 pa¹¹阳平乙调; “花”是 xua³²阴平调, “花～·轿”是 xua²⁴阳去调, “花莲·～”是 xua⁰轻声调。昌黎的单字音节表也必须为这三类轻声字排列轻声词例。

《昌黎方言志》第捌章是分类词表。除了第叁章第二节“昌黎特殊词语举例”之外, 讨论昌黎词语的内容几乎都集中在分类词表里。其实, 在任何方言的调查报告中, 这都是一个占有很重要地位的部分。在方言调查的实践中, 记录词表不仅是记录方言词语的整体面貌, 也是语音记录的一个全面检验和补充, 同时又是记录语法现象, 直至记录方言篇章的基础。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三者, 有时候是通过词语的调查研究串联起来的。

丁声树先生领导的昌黎调查, 高度重视词语的调查。熊正辉先生在《跟随丁声树先生在昌黎调查方言》一文中, 记述了词语调查之前充分的准备工作: 在分组出发调查之前, “大约花了一个来月的时间讨论词汇调查表, 也就是丁先生主持编的方言词汇调查表。丁先生一直主持这个讨论, 几乎是逐条逐条地过了一遍。主要是让大家掌握每条词调查的要求, 明确词义范围, 注意调查时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差错。”

本章的分类词表把昌黎词语分为36类, 大部分按词义分类, 也有少数是按词性分类的。例如第29类是“一般名词”, 第30类是“代词等”, 第32类是“副词、介词等”, 第34类是“量词”。很多大类条目众多, 在底下再细分小类。例如第2大类下, 再分

(1) 地, (2) 山, (3) 河海, (4) 石沙土块及其他, (5) 城乡, (6) 本县村镇特殊读音等六小类。可见,这个分类词表带有普遍性,它能够反映汉语方言普遍的词语共性。同时,这个分类词表也很好地反映了北方地区官话方言,特别是昌黎地区方言的个性,它充分照顾了昌黎地区的社会生活特点。例如分类词表第7类“农业”,其中(3)“农事”关于麦地耕作,场院生产,(4)“农具”关于锨、镰的描写,第9类“交通运输工具、邮电”,其中(2)“大车的各部分”详细地记录了大车各个部位的叫名,(3)“驾具”详细记录了各种驾具的名称,各个部位的叫名。第15类“饮食”,其中(3)“麵食”列举了各种面食,包括制作各种面食的有关动作“和、搋、搋、揉、擀、切、抻”,“蒸、馏、熥、烙、贴、包、揪、烩”。所有这些都是反映昌黎地区农村社会生活特征的,分门别类,非常细致周到。

这个词表反映了词语说法的内部差别。这些差别包括:(1)以昌黎城关为主,包含张家石门、朱建坨、曹东庄、陈官屯等四处的地域差别;(2)通用词语与少用词语的差别;(3)新兴词语与旧来使用,现在少用词语的差别;(4)新老的差别。通读这个词表,可以看到昌黎词语的变化和发展,也可以看到词语的时代层次。

三、从昌黎音和北京音的比较说起

阅读《昌黎方言志》,我们自然会注意到第6章“昌黎音和北京音的比较”。昌黎音和北京音差别不大,音值和演变大致相同或相近,所以声母和韵母的比较,排列个对照表,再列出例外字北京读音就说清楚了。只有卷舌韵和声调的比较需要费点笔墨,以说明卷舌韵在昌黎和北京不同的分化条件。如果我们比较的是跟北京话差别很大的方言,这就相对复杂和困难。有人问,为什么要比较方言音和北京音?《昌黎方言志》没有说明理由,但是,只要看看广州音和北京音的比较,就明白其中的重要性了。

多数粤语研究者区别广州话的 [k- k'- h-] 和

[ku- ku'- u-] (有人也写作 [kw- kw'- w-]) 两套声母,理由是把介音 -u- 归入声母之后,虽然多了[ku- ku'- u-] 三个声母,但却少了[ua uai uan uat uaŋ uaŋŋ uaŋŋŋ uaŋŋŋ uaŋŋŋŋ uaŋŋŋŋ] 等 16 个韵母。如果不做比较,似乎很有道理。可是比较一下北京话,问题就来了。下面简单比较广州的 [a] 韵和 [u] 韵的拼合关系,例字选自李新魁等《广州方言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

[kua] 瓜呱, 寡, 挂卦褂

[ku'a] 跨垮胯, 挎

[ua] 洼划~船, 娃娃哇, 华哗桦, 挖, 话华画

[kuu] 沽姑姑孤, 菇咕鸪, 鼓古估股, 故固顾

[ku'u] 篦

[uu] 乌呜污, 胡湖壶糊, 汝, 恶, 户护互沪

根据这个比较,我们必须说北京话的 [k- k'- θ-] 也对应于广州话的 [ku- ku'- u-],北京话的 [ua] 对应于广州话的 [a]。实际上这是不合语言事实的,除了声调调值不同以外,这些字的声韵母北京话和广州话没有区别。现在的区别是由于表述符号的不同人为造成的。更为尴尬的是,北京和广州明明是零声母的“乌呜污”等字,广州必须写做 [uu]。只有把广州话和北京话进行比较,才能看出是否合理。

方言音跟北京音的比较,可以看出方言语音的结构规律和特点,方言音跟《切韵》音的比较,可以看出方言语音的古今演变规律和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它可以更方便于解释方言的语言事实。有意思的是,《昌黎方言志》没有昌黎音和《切韵》音系的比较,这个跟它前后的很多重要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很不一样。后来有机会就此求教李荣先生。李先生快人快语,说那个年代让出方言志,已经很不容易,还要去说《切韵》,说古今比较,不是自讨没趣?真是一语中的!不但没有专门讨论古今比较,除了极个别地方说到古音声韵之外,《昌黎方言志》是几乎不说历史音韵的。

就是说,《昌黎方言志》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强烈的时代烙印。这种烙印还可以在书中的其他地方看

到。例如标音举例开篇两首新诗，就是“主席真伟大”、“多亏有[口留]共产党”；分类词表里设置了第5项“政治”一类，放在天文地理、时令节气之后。条目安排是“共产党”领条，“人民政府”在后，“党旗”在前，“国旗”在后。后头第35项又有“新词新语示例”一类，收录了当时流行的很多新词语，如“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积极分子、落后分子”之类，随后特意加上一个“附说”，专门讨论新词的增加和旧词使用范围的缩小。所有这些安排，都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丁声树先生高超的学术智慧和严谨审慎的风格。

四、余论

略微了解近百年汉语方言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走的是一条继承、发扬、借鉴、创新的道路。《吕黎方言志》继承了在此之前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但不拘泥旧说，而是有很多发扬、创新。它成为在此之后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典范。《吕黎方言志》内容简介说，该书“可以作为进一步调查汉语方言的参考”。其实，《吕黎方言志》不仅仅是参考，它跟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赵元任等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罗常培的《厦门音系》、和《临川音系》等著作一样，都是汉语方言学的经典之作，是必读之书。如果没有详细研读这些著作，请不要对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评头品足，指手画脚。

学术研究最宝贵的品质是实事求是。根据汉语方言的语言事实，进行调查研究，进行实事求是的解释，这是《吕黎方言志》的本质，也是汉语方言学科得以发展的传统和经验。近读报章，有几段话引人深思：

《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8月11日第2版讨论学术研究与外交政策，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王义桅说：“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自己的理论，而是不敢追求自己的理论，在无休止学习西方理论的过程中迷失自我，乐此不疲地去研究人家的理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大有可为，关键是学术研究要说中国话、体现中国思维、折射中国情结。”

《北京晚报》2009年8月11日第43版“文化时评”发表李承志《国画姓“国”》说，最近看了几本画册，突然发现有些国画，画山不像山，画水不像水，看不大懂了。请教一位行家，他说：那是你的观念落伍了。现在提倡与国际“接轨”，引进西洋画法呀！文章说：“国画毕竟姓‘国’，自有本身特定的规范，要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点。借鉴西洋画法，正是为丰富、突显国画的这些特色。倘若喧宾夺主，以‘引进西洋画法’为由，把国画自身独有的特质丢弃，那还是国画吗？”“‘接轨’的目的是‘求同’，但艺术的真谛是‘立异’。有句大家都熟悉的话：越是民族性的东西，越具国际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8月13日第3版，刊登北京读者来信《学术理论应该反映现实》说：“理论文章不能在学术名词上转圈，在理论术语上大做文章。从理论到理论，从观念到观念，读来读去，不见社会实际，所以读不懂。学术理论应该反映现实，解释现实，提出问题，指出科学道路，不能作空洞之谈，更不能玩‘玄学’。”

这几段话是值得参考的。